

辽博展出的《石鼓文拓本册》藏着大秘密 这10块“大石头”在唐朝时就是国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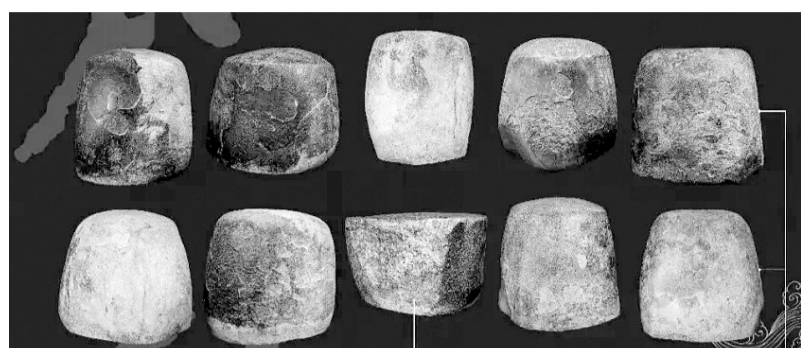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 吴 限



核心提示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陈仓石鼓被称为“镇国之宝”。辽博展出的《石鼓文拓本册》就是石鼓上的文字拓片，被称为“篆书始祖”。这10只石鼓在唐朝时就被尊为国宝，深受世人的珍爱。它们历经磨难，三次被毁，其中一只竟然被当作磨刀石。透过这些沧桑的文字，这10只石鼓展示出来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

现保存于北京故宫的“沂殿”石鼓。



十只石鼓现状(上图)及被做成捣米臼的“乍原”石鼓(下图)。

石鼓文记录着汉字的演进历史，是“石刻之祖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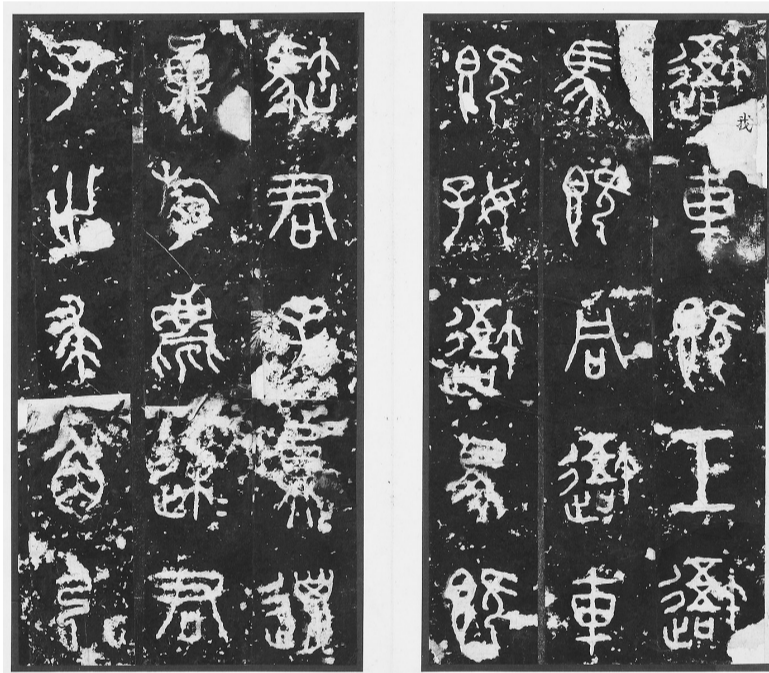
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书法展第二期展览中，有一件非常珍贵的《石鼓文拓本册》，它不仅隐藏着诸多的秘密，更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。

史料记载，唐朝贞观年间(公元627年-649年)，在陕西凤翔府陈仓山(今宝鸡市石鼓山)北坡的荒野之中，一位牧羊老人发现了10只怪异的花岗岩大石头。这些硕大的石头形似鼓，圆而见方，上窄下宽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中间微凸，模样奇特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当石头上的泥土被清除后，每块石头上都精心篆刻一首四言古诗。因为笔法奇异，当时竟无人能识，又因石形如鼓，称之为“石鼓”，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“石鼓文”。

当时发现的时候上面总共有718个字，现在能辨认清楚的字只有300余字。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，故又称它为“猎碣”。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0只石鼓，其文字大多磨灭，尤其是第九鼓已空无一字。经过历代研究，根据鼓身上的文字，研究者将十只石鼓分别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沂殿(qiān yì)、田车、鸾车、雷(líng)雨。

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，记录着汉字的演进历史，被称为“石刻之祖”，它是大篆向小篆过渡的活化石，是“文字记忆定格”。“打个比方说，从甲骨文到石鼓文，汉字的演变类似于从猿人到智人的进化历程。”辽宁省博物馆学术部副主任董宝厚说。

董宝厚进一步解释说：“石鼓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，它记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，填补了史学空白。同时，石鼓文在中国金石史乃至书法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它承上启下，是从甲骨文、散氏盘、秦公簋，到篆书演变的重要一环，所以石鼓文又被称作‘篆书始祖’，后面的隶、草、行、楷都是它的子孙了。它本身的书法价值非常高。石鼓文线条较金文更加匀整圆润，字形结构较甲骨文和金文简单，整齐而略呈长方，平行线条多作排列装饰，严谨茂密，用笔圆劲挺拔，笔道遒劲凝重，字距行距开阔均衡，疏朗如晴空星月，字大逾寸，气韵淳古，雄浑浑厚、朴茂自然，受到历代书家推崇，被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。现在来说，凡设有书法专业的专业院校都把石鼓文定为必临习的碑帖，也可以佐证石鼓文的重要地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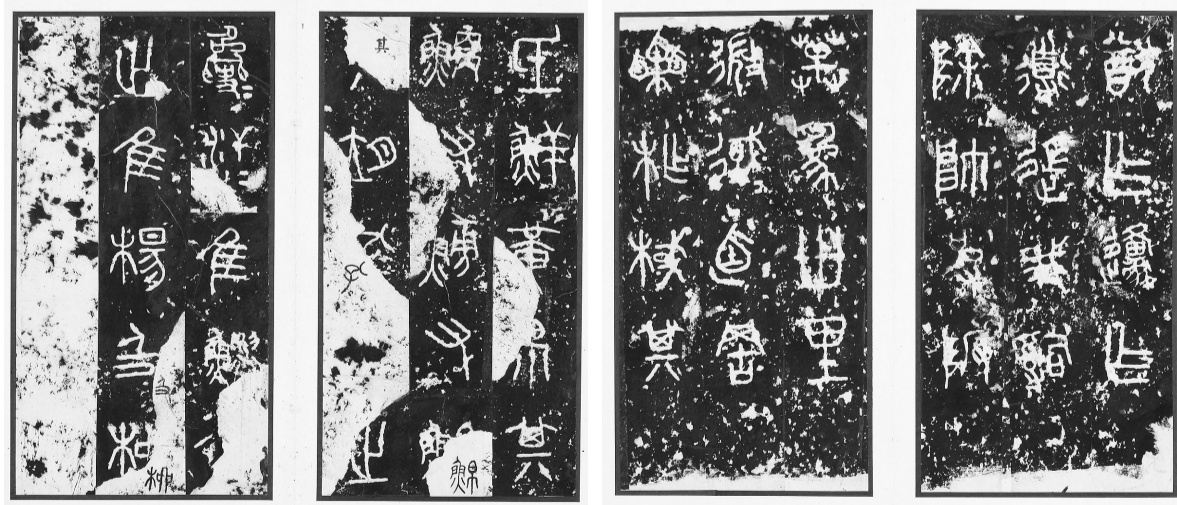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石鼓文拓本册》中的拓片。

研究部主任董宝厚说。

董宝厚进一步解释说：“石鼓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，它记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，填补了史学空白。同时，石鼓文在中国金石史乃至书法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它承上启下，是从甲骨文、散氏盘、秦公簋，到篆书演变的重要一环，所以石鼓文又被称作‘篆书始祖’，后面的隶、草、行、楷都是它的子孙了。它本身的书法价值非常高。石鼓文线条较金文更加匀整圆润，字形结构较甲骨文和金文简单，整齐而略呈长方，平行线条多作排列装饰，严谨茂密，用笔圆劲挺拔，笔道遒劲凝重，字距行距开阔均衡，疏朗如晴空星月，字大逾寸，气韵淳古，雄浑浑厚、朴茂自然，受到历代书家推崇，被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。现在来说，凡设有书法专业的专业院校都把石鼓文定为必临习的碑帖，也可以佐证石鼓文的重要地位。”

文线条较金文更加匀整圆润，字形结构较甲骨文和金文简单，整齐而略呈长方，平行线条多作排列装饰，严谨茂密，用笔圆劲挺拔，笔道遒劲凝重，字距行距开阔均衡，疏朗如晴空星月，字大逾寸，气韵淳古，雄浑浑厚、朴茂自然，受到历代书家推崇，被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。现在来说，凡设有书法专业的专业院校都把石鼓文定为必临习的碑帖，也可以佐证石鼓文的重要地位。”



辽博收藏的“黄帛”本。

《石鼓文拓本册》中的拓片。

韩愈的保护石鼓奏折被压了8年

故事再回到1300多年前的盛唐时代。

石鼓文的发现震惊了朝野。文人墨客纷纷慕名而至，一窥究竟，他们拓下石上的文字，遍寻名家研究。唐初的书画家、诗人，如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等人在看到石鼓文的拓本后，皆惊叹石鼓文的“古拙”，纷纷前来，争相为其作诗写赋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写过一首《石鼓歌》，全文洋洋洒洒500余言：“张生手持石鼓文，劝我试作石鼓歌……故人从军在右辅，为我度量掘臼科。濯冠沐浴告祭酒，如此至宝存岂多。毡包席裹可立致，十鼓只载数骆驼……牧童敲火牛砺角，谁复著手为摩挲。日销月铄就埋没，六年西顾空吟哦……呜呼吾意其蹉跎。”从中可以看出，韩愈当时是希望朝廷能把石鼓用几匹骆驼驮回京城长安，以便更好地保护珍贵文物，也利于研究，但他的建议没被采纳，石鼓在杂草丛中长满青苔，任凭“牧童敲火牛砺角”。

公元755年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跑到陕西宝鸡雍城附近躲避战祸的唐肃宗听到石鼓的传闻后，心生好奇，责令州府官员将10只怪石运下陈仓山，迁往雍城城南，与驻扎在这里的文武百官一起赏玩。不料，石鼓迁至雍城不久，叛军逼近凤翔，文武百官出逃。为躲避战祸，石鼓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，并对外宣称“毁失”。“安史之乱”平定后，陈仓石鼓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机。公元806年，地方官吏查访到了石鼓的埋藏之处，请朝内的名家主持挖掘。韩愈还因此上书朝廷，请求移石鼓至京城太学府内妥善保管。但韩愈的请求未引起朝廷重视，奏折在朝堂上被积压了8年。公元814年，郑余庆就任凤翔尹，兼职国子祭酒，主掌国家教育、文化。他偶然看到了韩愈的奏章。于是，重新奏请朝廷，希望能妥善保管陈仓石鼓。于是，曝于荒野的石鼓才被移送到当地孔庙。

石鼓重新出世，已是蚀迹斑斑，石鼓上的字迹残缺不全，引得无数名家学者惋惜。更可惜的是，由于一直被弃于荒野，其中一面“乍原”石鼓居然莫名遗失。90多年后，随着李唐王朝的坍塌，凤翔孔庙在战火中被焚毁，庙内所藏的9只石鼓也被人盗走。

寻找了200多年的国宝 被当成了捣米臼、磨刀石

北宋一统天下后，宋仁宗无意中发现了关于石鼓的传奇纪录，对遗失百年的陈仓石鼓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令人遍地寻访，查找陈仓石鼓的下落。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光之父司马池几番周折，终于找到石鼓，但寻到的石鼓只有9只，早在唐末便已遗失的“乍原”石鼓仍没有踪迹。司马池为了得到皇上的嘉奖便私下遣工匠仿制出一只假的“乍原”石鼓。不料，被宋仁宗和名家学者识破。司马池获欺君之罪，更被磨去了大半，损毁严重，仅余下半部的4行文字。

公元1110年，“乍原”石鼓运抵京城，石鼓被正式移送至太学内保存，10只石鼓终得团圆。转眼到了宋徽宗时期，他对石鼓更是痴迷，居然下令在10只石鼓上的文字槽缝之间填注黄金，为其装了金身。“靖康之变”时，金兵攻入汴梁，搬走了徽、钦二帝。这10只石鼓因填注了黄金被金兵视为珍宝，随着徽、钦二帝北迁。石鼓被运到燕京(今北京)后，金人剔去了石鼓上填注的黄金，将石鼓丢弃荒野。至此，石鼓第三次因战祸而被遗失荒野。

公元1234年，南宋和蒙古联军攻破燕京，随军而至的御史大夫王楙发现了掩藏在废墟之中的10只石鼓。王楙将其保存于孔庙之中，并请专人看护。而后的元、明、清三代，石鼓一直在北京孔庙内存放。

宋代拓本存留501字 最好的拓本保存在辽博

“吾车既工，吾马既同。吾车既好，吾马既阜。君子员猎，员猎员游。鹿(you母鹿)鹿速速，君子之求。骝(角弓)弓，弓兹以寺。吾歌其特，其来趣趣(chì chī 踟蹰不前)”。这是石鼓文“吾车”中著名的一首诗，其文采可以比肩《诗经》，深受世人喜爱。

那么，这些石鼓是何时何人刻制的呢？答案是秦朝或秦朝以前。秦时，国君喜欢将自己的丰功伟绩刻于石上，流传后世。秦始皇东巡曾留下了诸多石刻，目的就是刻录自己的丰功伟绩。“以此推理，石鼓应该是秦国疆土到达了发现石鼓的地方——陕西宝鸡陈仓，是最先到达此地的秦国国君，或者在此当政的国君所立。”董宝厚说。由于石鼓文刻石中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年代和官员的信息，所以到底是谁刻的哪个国君所为，争议不断。宋朝郑樵《石鼓音序》确定石鼓为先秦所刻，这一观点得到多数人认同。清末震钧认为是秦文公，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，郭沫若认为是秦襄公，今人刘星、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。如今，对石鼓的年代考证仍在继续中。“石鼓文的拓本，唐代就有，但没有流传下来。宋代欧阳修也曾经拓过石鼓，当时辑录了石鼓上的465个字，这个拓本现在已经失传了；明代大收藏家安国藏有宋代石鼓文3个拓本，其中‘中权本’存留501字，是现存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、最好的拓本，但这个拓本连同其他两个宋拓本流落到日本，现藏于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。”董宝厚不无遗憾地说。据了解，国内现存最早的拓本是明朝拓本，因第二鼓第五行“黄帛”二字不损，故称“黄帛”本。国内已知“黄帛”拓本有上海博物馆两件、北京故宫博物院两件、上海图书馆一件。辽博收藏的石鼓拓本，第二鼓第五行“黄帛”二字未损，推测应该是明末清初的拓本，一共残留344个字，是石鼓文拓本里最好的版本。辽博本次展出的拓本，共计167个字。据董宝厚介绍，此拓本最早为收藏家朱翼庵先生旧藏，上有朱翼庵、王懿荣等收藏印。石鼓如此珍贵，但石鼓上除了有石鼓文，竟然还有行楷。董宝厚说：“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喜欢在历代书画名迹上题诗题跋。他还题过石鼓诗，并刻于石鼓之上。”据文献记载，乾隆五十五年(公元1790年)正月，时年80岁的乾隆开始研究石鼓文，而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考证颇具传奇色彩的“乍原”石鼓的流传过程。乾隆帝据韩愈《石鼓歌》中写到的“为我度量掘臼科”句，认为“乍原”石鼓在唐代时已成臼形，而非宋时散佚后所为，因此有感而发，写下了一首诗，并命刻在石臼周围平面上，从此，此诗便与“乍原”石鼓共存了。(辽宁省博物馆供图)



乾隆题《石鼓诗》拓本。